



此外，军区有3个文工大队，各分区均有分区剧团，秧歌队、儿童剧团、农村剧团等遍布城镇乡村。其中新安旅行团是最负盛名的综合性文艺团体，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亲笔致函新安旅行团，勉励他们。新闻出版方面，《新华日报》（华中版）日出数万份，分区均有日报或大众报，如《江海导报》《盐阜大众》《苏北报》等共32种。著名刊物有《华中通讯》《民主建设》等10多种。这些报刊拥有1万多名通讯员，陈登科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本是一个粗识文字的普通战士，从写百字的新闻通讯稿起步，成长为一位知名的作家。

5. 土地改革的成功范例。

苏皖边区前期经过惩奸反霸和清算斗争，群众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从总体

苏皖边区政府与新中国的成立（七）

□柳宏为 於剑山

上看，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华中农村占统治地位，封建剥削远未消除。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国内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迫切要求清除封建剥削，党必须及时将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华中分局立即召开分局及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对土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华中分局首先选择淮安县鹅钱乡进行试点，派出以分局民运部副部长李坚真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进驻鹅钱乡，具体领导土改工作。邓子恢5月底自延安回到淮安后，亲自抓了鹅钱乡的试验，并撰写了《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总结推广这个乡的

土地改革经验。其后，华中分局先后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五四”土地政策新决定的指示》《关于在减租减息清算中解决土地问题办法的指示》《关于土地问题给各级党委的一封信》等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掌握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消灭解放区内残存的封建土地占有制，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华中分局采取边实践、边总结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法，相继在第五、第六、第七、第一和第二行政区开展土改工作。刘瑞龙、张维城、曹荻秋、欧阳惠林、陈立平等分局领导分别到各地蹲点指导。自1946年6月开始，在土改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土改运动迅速在苏皖解放区推开。参照鹅钱乡土改分田的做法，各地广泛宣传“五四”指示，做好调查统计，开展斗争清算，通

过分配、复查，最终确定产权。最后则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总结经验，教育群众。此外，土改过程中有一批苏皖边区进步士绅主动献田，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皖边区的土改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鹅钱乡作为华中土地改革第一个典型范例，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在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鹅钱乡最先实行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地分配政策，被称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谭震林、张鼎丞、李坚真等华中土地改革的亲历者，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又领导和参与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双休日，教两岁半的孙子背诵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孙子突然问：“爷爷，这是什么草呀？”我说：“是一种茅草。”他又问什么是茅草呀？我说：“就是长在地里的一种根很长的草……”末了，我说了一句，那草根可好吃了。谁知，孙子不依不饶了，缠住我一个劲儿地喊：“爷爷，我要吃……”孙子的话语，让我回到了童年。

我们这些“60后”小的时候，在过去乡下农村的田间地头，甚至大路边、田旁，随处可以见到一种外观和芦苇相似，植株瘦高、叶片有点像竹叶的草，那就是茅草。茅草，生命力十分顽强。无论你割它几遍，它都会很快又冒出来，不多时日，又是茂密一片。它从不怕烈日晒和严寒冰冻。特别是到了冬季，你哪怕一把火把它烧得精光，第二年一开春，它又是一片生机盎然。因此，在广袤的江海大地上，除了庄稼，还有很多很多的茅草。

打记事起，我们就知道茅草根是可以吃的。茅根，从地里挖出来，白白的、细细的、长长的、一节一节的，让人垂涎欲滴。略懂中医的父亲告诉我们，茅草的根，味甘、略苦，性是寒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凉血、止血。因此，农家一旦有人吐血、尿血、鼻子出血、牙出血等等，就常用茅根来治。由于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人们往往也用于治疗热毒或者湿毒这些病症，比如像肝炎之类的病，以及由于胃热导致的恶心、呕吐。

印象中，每年3月至4月中旬，是挖茅草根吃的最好时节。我们这些小孩子，又似乎对茅草根情有独钟。每每一挖一篮子，拎到沟里洗一洗，就塞到嘴里，嚼着、嚼着，嘴丫边常常溢出甜甜的液汁，嚼完一口，还伸出舌头，将嘴边的甜汁送入口中，仔细品尝那特有的滋味……那个甜味儿啊，透心透骨地扩散到全身，传播到每一根神经，甜到心里，真真儿的难以言表。

茅草根

□包宏龙

我家的红色历史

□徐清革

1998年，我父亲65岁时写了一段备忘录式的文字，记载了我祖父徐玉彬（1906—1977）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在如皋西南乡镇张黄港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经历。内容主要来自祖父生前口述，文稿中特别标注：“我家除我而外都不清楚，（笔记下来）以备后代家史的查考”，可见这段历史在他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尽管如此，这份手稿还是延续了他字迹潦草，多有笔误和涂改的习惯。加之口述与记录相隔时间长达四十多年，记忆偏差和讹误在所难免。但我觉得这段家史连接着

地方秘密党史的情节，如果任其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殊为可惜，就着凌乱的手稿梳理了一下大致线索，以飨读者。

1940年，新四军东进，进入如皋境内，徐玉彬在石庄楼房头（现石庄镇楼房村）加入中共秘密组织，其身份和工作严格保密，有“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一说。1941年9月中共如西秘密县委成立，与公开的如西县委（甲种系统）平行且不发生横向联系，称为“乙种系统”，书记改为特派员，秘密党的组织成员必须政治上绝对可靠，每个党员和支部

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要有坚强的战斗力等。其组织成员、活动方式、上下级关系等均绝对保密，一切工作和行动秘密进行，上下级之间单线联系，上级的真实姓名和秘密身份，下级不知道，有的支部内党员与党员之间也不相识。在联系工作时，都以某种公开职业身份为掩护。这样，即使公开的党组织遭到破坏需撤离原地，而地下党组织仍能很好地担负起战斗任务。随后几年，作为乙种系统内的秘密党员，我祖父徐玉彬最初的公开身份是张黄港码头上“捉小猪”的装卸工人。

1945年9月，如西县复名如皋县，徐玉彬和杨锡山开辟建立张黄港镇政府，杨锡山、芦志祥任正副镇长，吕正高任指导员，徐玉彬是党的特派员。1946年国民党军大举进犯苏中解放区。为了应对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同年11月，在地委秘工科直接领导下复建了“乙种系统”，由县委副书记丁正铎分管，设县区特派员，领导支部小组和个别党员，石庄区是俞必学领导的三个支部36人，徐玉彬是其中一员，仍担任张黄港镇特派员，掌有“生杀”大权，公开职务是副村长，群众称之为“乡主席”。

